

# 关于细石器技法起源的一点看法

何锟宇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 宽型楔形石核是剥取细石叶的母体之一, 对研究细石器技法的起源和工艺传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比较华北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楔形石核的工艺和年代早晚, 认为华北地区以宽型楔形石核剥取细石叶的工艺可能受到了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影响。

关键词: 宽形楔形石核; 华北地区; 西伯利亚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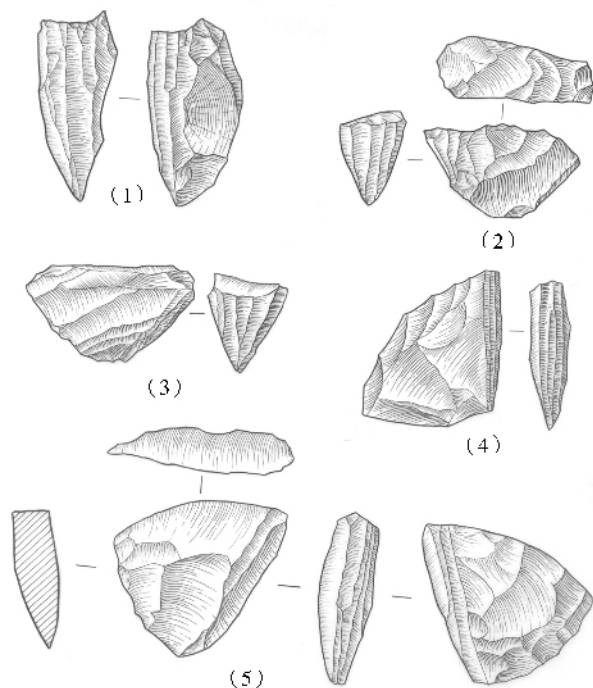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8)02-0038-06

细石器 (Microlith)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 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甚至历史时期。细石器是一种采用特殊的工艺技术而产生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和细石叶加工所成的石器, 它们是作为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严格地讲, 细石器一词, 应以此为限<sup>[1]</sup>。从其外形特征和分布来看, 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即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细石器, 前者主要分布于欧洲、北非、西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区, 而后者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东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 两者有相似之处, 但差别是主要的, 应该属于不同的石器工艺传统, 本文要探讨的是后者。此前, 中国一部分学者将细石器的内涵和外延扩大化, 例如“细小石器”等称法, 本文所说的细石器与以前的“典型细石器”对应, 其工艺特点是用间接打击法从细石核生产细石叶, 细石叶小而细长, 两缘平行, 长为宽的两倍以上 (注: 石片宽大于 12 毫米, 长大于 50 毫米的为石叶; 小于此长和宽的为细石叶)。细石核是生产细石叶的母体, 为了便于生产细石叶而加工成各种形状, 所以, 通过对细石核的研究可以部分反映细石叶的生产过程。在细石叶细石器流行的亚洲东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常见的细石核有楔形的、锥形的、船底形的、扇形的、柱状、漏斗状等, 但从目前的观察研究来看, 不同细石核上生产出来的细石叶并没有差别。

关于细石器的起源, 20 世纪 30 年代, 国外学者多认为中国东北的细石器起源于西伯利亚, 由蒙古高原传播至我国东北; 20 世纪 40 年代裴文中先生认为我国细石器起源于东西伯利亚<sup>[2]</sup>。解放以后, 随着材料的增多, 对细石器的起源更多的学者认为是在中国华北起源的<sup>[3]</sup>, 也有的

认为是环境相似“趋同”的结果<sup>[4]</sup>。总体看来, 华北起源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了主导, 影响也最深远。但近年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多, 资料的不断积累, 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发掘材料的公布, 给细石叶细石器起源和传播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单一的华北起源说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sup>[5]</sup>。西伯利亚地区的旧石器考古近年取得了重大进展, 研究成果可以《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时代: 新的发现与阐释》(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为代表, 高星先生曾对该著作予以了中肯的评介<sup>[6]</sup>。我们认为, 细石器的起源是个复杂的问题, 笼统的讨论不能使问题清晰化, 我们应该将目光转向产生细石叶的母体的各种石核来考察, 复原其修理石核和剥取细石叶的方法。本文在分析中国华北的考古材料的基础上, 结合朝鲜半岛和西伯利亚地区新出土的考古实物资料对产生细石叶的宽型楔形石核时空分布进行简略探讨, 认为宽型楔形石核最早应该产生在西伯利亚地区, 华北地区以宽型楔形石核剥取细石叶的工艺可能受到了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影响。

楔形石核主要是依据外观形态定义的, 楔形细石核的最主要特征是对剥片无直接关系的楔状缘进行修理<sup>[7]</sup>。依据形态可以将楔形石核划分为宽形和窄型两种, 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宽型楔形石核。关于其打制方法, 有人认为是把一个从两面加工的椭圆形的石核, 从一侧边截去一片, 使它出现台面, 然后再从一头沿着台面剥落石片<sup>[8]</sup>。贾兰坡先生称在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组合中, 常见有两面加工的舌形器物, 并发现有很多这类石核是从舌形器物改制而成的, 因为有许多楔形石核恰为舌形器物的二分之一, 而扇形石核则为



图一 华北地区出土楔形石核  
(1-3, 下川遗址; 4-5, 虎头梁遗址)

舌形器物的四分之一; 并认为楔形石核系利用残舌形器物加工成的<sup>[9]</sup>。前面学者研究的结果来看, 对楔形石核的修理方法大家基本取得了共识, 这也是我们比较华北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宽型楔形石核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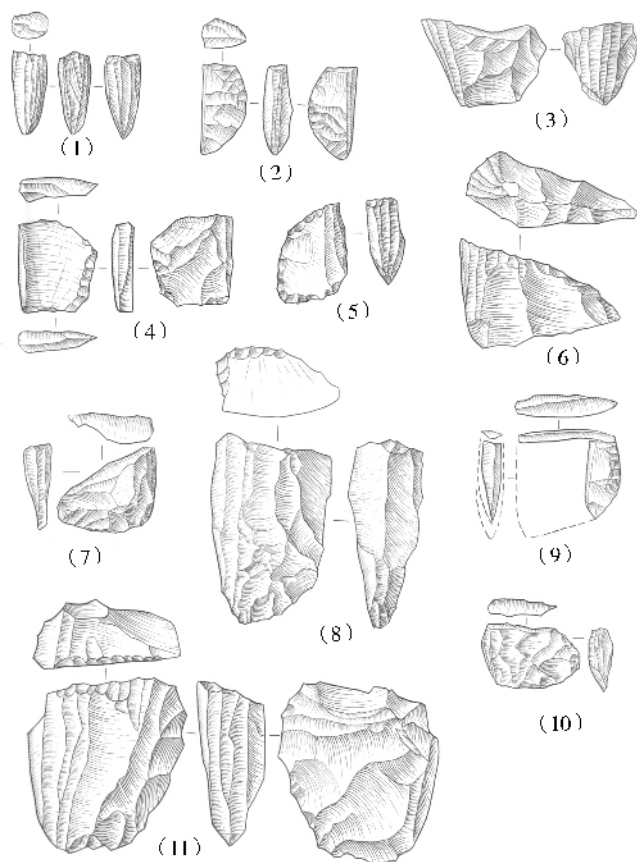
在华北地区, 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是有地层有测年最早的含细石器工艺的遗址。下川遗址分上下两个文化层, 其中含细石器的为上文化层, 其中上层含细石器同层位的木炭的碳-14测年数据最早为  $21700 \pm 1000$  a.B.P., 最晚为  $15940 \pm 900$  a.B.P. (另外2个数据为:  $21090 \pm 1000$  a.B.P.,  $16400 \pm 900$  a.B.P.)<sup>[10]</sup>。下川遗址发现的石核有锥状、楔状、柱状和漏斗状等, 其中锥状151件, 楔状34件, 柱状10件, 漏斗状24件, 以锥状为主。典型器物有琢背小刀、雕刻器、尖状器、锥钻、石镞、刮削器和石锯等, 其中石镞等器物使用了压制法加工。楔形石核分为两种, 一种是宽型楔形石核, 呈扇形(图一, 2、3); 另一种为窄形楔形石核, 核身较窄, 横断面呈杏仁状(图一, 1)。下川两面加工的石器数量极少, 除石镞和少数几件尖状器外, 所以下川的宽型楔形石核不是严格意义上定义的可能由残断的两面加工的舌状器或尖状器或刮削器加工而成的。发掘者王建先生等认为晚期的楔形石核往往利用两面加工的残断尖状器或刮削器作为楔状石核, 而下川的楔状石核是直接打击而成的<sup>[11]</sup>。

从图一, 2~3 我们可以看到, 下川遗址的宽型楔形石核台面多不加修理, 呈长条形; 纵剖面虽然呈楔形, 但仅一面加工, 然后从自然台面上往下剥落细小石片。

河北阳原县虎头梁出土的细石核只有楔形石核和柱状石核两种, 其中楔型石核 236 件, 柱状的 17 件, 另有两极石核 10 件和盘状石核 16 件<sup>[12]</sup>。如果与下川的细石核比较, 虎头梁的楔形石核均应为宽形, 虎头梁的楔形石核形体上端宽下端窄, 前端宽后端窄, 有的台面比较平坦, 台面呈等腰三角形, 有的台面向石核隆起的一面倾斜(图一, 4-5)。另外, 用间接打击法从楔状石核上剥离的细石叶约 300 件, 剖面呈三角形或梯形, 碳-14 断代为  $11000 \pm 210$  a.B.P., 属更新世末期。与下川的宽型楔形石核不同, 从图一, 5 我们可以看到, 虎头梁遗址的宽型楔形石核的台面经过简单修理, 为素台面; 纵剖面呈楔形, 而且两面加工去薄, 如同对一件器物做两面加工修理。总的看来, 不管是对台面还是楔状缘的加工修理, 两者都有较大的区别, 应该不属于同一技法系统。虎头梁遗址的楔形石核形制稳定, 技术已经趋于成熟稳定, 而且在石核中的比例也占优, 这也是华北地区以前发现的细小石器遗址中不见的现象。

朝鲜半岛近年新发现的材料较多, 例如韩国垂杨介遗址<sup>[13]</sup>。该遗址的上部旧石器文化层石器主要是用石锤从石核上直接打击而产生的, 间接打击法、压制法等剥离石片的技术也在使用。发掘出土有手斧(3)、砍砸器、刮削器、刀形石器、石斧、有舌尖状器、细石核等一批非常典型的石器。细石核一共有 195 件, 平均重量为 32.5 克, 长度为 51 毫米。作者将其分为三种制作方法产生的, 认为从石器制作的方法分析来看, 采用了下川、虎头梁技法, 同时同日本的甬别、荒尾、恃下等技法相似。该层的孢粉出现松科、莎草科、稻科这样几种植物, 说明当时以温凉气候占主导, 当属于玉木冰期的寒冷期。

索哈季诺(Sokhatino)遗址位于外贝加尔的赤塔州, 分布在音国达河的左岸, 其中以4号遗址出土遗物最为丰富, 遗址位于第一级台地上, 高出河面 10-12 米, 共分 12 个文化层<sup>[14]</sup>。石制品有石核、修理石叶、尖状器、雕刻器、刀、穿孔石器等。石核以楔形石核为主, 第 11 层 3 件, 第 7 层 17 件, 第 6 层 2 件, 第 3 层 15 件, 第 2 层 188 件, 有从早到晚增加的趋势(图二, 8、10)。8-10 层有石头建筑遗迹和炉壁痕迹以及一些加工完整的工具, 石器大部分较小, 包括端底石核、细石叶、端刮器、尖状器、边刮器和修理石叶等, 8 层还发现勒瓦哇石核。7 层包括一



图二 西伯利亚地区出土楔形石核

1、7、11(Selemdzha第一文化层; 2、4、9(Kurla、早文化层  
3、6、5(Krasnyy Yar第六层; 8、10(Sokhatino 4第7层)

些分散的石制品和3个炉壁,周围有支制品和动物化石,包括有披毛犀、马、赤鹿、驯鹿、野牛、驼鹿和羊等。而在1号遗址出土的石核以勒瓦哇占绝大多数,其中第8层发现有石头居址和炉面痕迹,石制品以小型的为主,有细石叶、端刮器、尖状器、边刮器和琢背小刀等,另有1件勒瓦哇石核,还有一些骨器,如骨椎、骨针和带刻划图案的骨板等。动物化石有披毛犀、猛犸象、麋鹿、赤鹿、驼鹿、绵羊、盘角羚羊、野牛和牛等。关于遗址的年代,第二级台地形成的年代为30000—13000 a.B.P.,这可作为4号址断代的基础,上文化层的动物骨骼测年为 $11900 \pm 130$  a.B.P.,第3层的碳-14测年为 $26110 \pm 200$  a.B.P.,这是两个数据( $26260 \pm 300$  a.B.P.和 $25950 \pm 300$  a.B.P.)的平均值,这和所出土动物化石的属种一致,属于最后冰期阶段,结合地质年代、动物化石属种分析以及碳-14测年的结果,4号遗址含楔形石核的文化层的年代应在25000—22000 a.B.P.之间。2号址仅发现1件勒瓦哇石核,柱形石核和楔形石核分别为11和5件。3号址则未发现勒瓦哇石核,只有柱形

和楔形石核,莫斯特尖状器基本不见,可以看出和4号址有时代差异。从图二,10我们可以看到,出自4号址的宽型楔形石核,台面经过较精心的修理,为修理台面,楔状缘两侧都经过了加工去薄,与虎头梁遗址的宽型楔形石核如出一辙。

Krasnyy Yar I 遗址位于西伯利亚中南部安加拉河右岸,距离 Irkutsk 213 公里,遗址高出河面 16-20 米,文化堆积 2 米厚,分为 7 个文化层,各层文化面貌相差不大,8-10 层无文化遗存<sup>[9]</sup>。第 VII-X 层的年代相当于早期萨旦冰期堆积,第 6 层的骨骼测年为  $19100 \pm 100$  a.B.P. VII 层有 369 件石制品,主要为石片和碎片,另有石核和一些修理的工具,有 9 件细石叶,系从楔形石核上剥离的,动物化石少。第 VI 层有 2000 余件石制品,包括石片、石叶、修理石叶、尖状器、雕刻器、边刮器和楔形石核等。剥取细石叶的石核只有楔形石核一种(图二,3、5-6)。这两层缺少莫斯特时期的刮削器,属于同一文化,中间有小的间隔。这些地层文化遗存的分布反映了部分狩猎营地的特点,处于萨旦冰期的末期,距今大概 18000-20000 年。Krasnyy Yar 早期文化面貌是独特的,不但占据了安加拉河地区的特殊位置,而且在贝加尔湖西部或东部都没有类似的文化现象。其动物化石的种类,楔形石核的多种形式以及石叶加工的各种工具在该地区任何早于 20000 年的旧石器文化中都是不常见的。

Kurla 是多个地点的合称, I-III 地点发现于贝加尔湖西北湖滨, 1975 年发现,这三个地点的早期文化代表了贝加尔湖和整个中南西伯利亚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sup>[10]</sup>。1975-1979 发掘的可分为 4 个文化层,第 1 层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第 2 文化层为中石器时代遗存,第 3、4 层均为旧石器时代的遗存。第 3 层的碳-14 测年为  $14150 \pm 960$  a.B.P. 和  $15200 \pm 1250$  a.B.P.,第 4 层的测年为  $24060 \pm 5700$  a.B.P.,年代可能有些偏早。早文化层发掘出土了 3386 哺乳动物化石和 6888 件石制品,原料多为燧石和石英。石制品的种类包括楔形细石核、有峭石片、雪撬板石片和大量细石叶,另有尖状器、边刮器和一些骨角器等。这些石制品与 Krasnyy Yar I 地点的第 VII 层相似,特别是楔形细石核的细石器技术,有些特征基本是一样的图二,2、4、9。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将 Kurla 早期文化与贝加尔湖西部和东部的归为同类文化比将南西伯利亚的北贝加尔旧石器文化归于久克泰文化的一个分布区更合适。

远东南部的瑟勒姆德扎(the Selemdzha type)类型由多个遗址群构成,该类型可以分为 4 期即 4 个文化层<sup>[11]</sup>,第 1 文化层以楔形石核为主,



分宽型(图二, 7、11)和窄型(图二, 1)两种, 另外有端底石核、单台面和多台面柱状石核、盘状石核等, 工具组合有雕刻器、修理石叶(包括反向加工和两面加工)、刮削器和用石叶加工的刀等。在这个文化层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似滑雪板状和船形裂片的出现以及大型两面器的出现, 他们可作为观察楔形石核和端底石核预制的过程。宽型楔形石核台面均为素台面, 楔状缘两侧都经过修理; 而且窄型楔形石核(图二, 1)的楔状缘两侧也经过了加工修理, 与 Kurla 出土的一致(图二, 2)。依据台地的地质年代, 推测这些石器的年代大约为 25000-23000 a.B.P.。第2文化层包括盘状石核、柱状石核和端底石核等, 窄型楔形石核极少, 而宽型楔形石核以及从其剥离下的细石叶有相当的数量; 在石器组合中有很多两面器和石叶加工的工具。从该层的一个灶面中提取的碳-14 测年为  $19360 \pm 650$  a.B.P.。第3文化层石器工业与第2文化层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第2层中的石核类型在第3层均有, 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新类型, 工具组合有修理石叶、端刮器、雕刻器、石核边刮器、两面器等。这些废弃的楔形石核位于棕色土壤的顶部并打破第2层和第3层, 该层的年代大约在 13000-14000 a.B.P.。第4层石器的典型特征是含有大量的楔形石核、端底石核, 还有一定比例的柱状石核和修理石叶等, 勒瓦娄哇石核则完全消失。该层的碳-14 测年为  $12960 \pm 120$  a.B.P.。从这4个文化层我们可以看到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的特点和文化传统, 如端底石核、楔形石核、柱状石核和勒瓦娄哇石核的出现, 以及与两面器、端刮器、边刮器、雕刻器、石叶技法和细石器技法共存到最后勒瓦娄哇石核的消失, 而以石叶技法和细石叶技法为主, 反映了石器工业和文化传统的变化, 其年代大概从 25000 a.B.P. 持续到 12000 a.B.P.。

从上面几个典型遗址来看, 在贝加尔地区, 石叶技法大致出现于 24000-23000 a.B.P., 石器工业主要表现为楔形石核、端底和柱状石核以及石叶和似石叶加工的雕刻器和端刮器、边刮器等共存, 而在外贝加尔地区同样有楔形石核和端底石核, 其共同年代大致在第四纪冰期的最后一个冰冻期萨旦冰期。同样, 一系列的柱状石核、楔形石核和端底石核以及石叶工业发现于蒙古高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以及北美西北部等地, 摆在我们前面的难题是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细石器工业首先产生和怎样的传播的; 形成和传播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是一个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的, 诸多问题等都有待于解决。从各地的发现情况比较来看, 《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时

代: 新的发现与阐释》的作者认为瑟勒姆德扎类型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 其原因有三: 其一, 柱状石核、楔形石核和端底石核的预制以及剥取石叶在该地区出现的时间不晚于 25000-24000 a.B.P., 而且盘状石核、勒瓦娄哇石核和砾石石核技术共存。其二, 在早期文化层, 两面加工石片工具的工艺是瑟勒姆德扎类型工具组合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其三, 在这个遗址的文化层的石核和石器种类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连贯性, 这些连续性说明至少在 15000 年前在瑟勒姆德扎类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考古学文化<sup>[18]</sup>。除此之外, 让我们必须关注瑟勒姆德扎类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在以瑟勒姆德扎类型为代表的西伯利亚地区所出土的石核中, 多以楔形和柱状石核为主, 而少见锥状石核, 而这一特点恰好也是虎头梁类型的特点而区别于下川类型。

下面我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东亚、东北亚和北美的石器技术传承、年代学证据和生态环境等几个方面来简单分析宽型楔形石核的起源和分布问题。

就宽型楔形石核本身来说,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虎头梁遗址(图一, 5)、瑟勒姆德扎类型(图二, 7、11)、索哈季诺(图二, 10)、Kurla 遗址(图二, 4)等的宽型楔形石核的台面多为素台面或修理台面, 楔状缘两侧均经过修理, 与下川遗址的宽型楔形石核差别明显。另外, 瑟勒姆德扎类型(图二, 1)、索哈季诺(图二, 8)、Kurla 遗址(图二, 2、9)和 Krasnyy 遗址(图二, 5)的窄型楔形石核也多在楔状缘两侧经过修理去薄, 与下川遗址的窄型楔形石核也有差别。所以, 下川遗址出土的楔形石核严格意义上与其他遗址的出土的修理方法不同, 在加工技术上也有差别, 他们的相似只是形态上的。

从旧石器晚期各地的石器技术传承来看, 在中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勒瓦娄哇技术, 而且也少见真正的典型的两面器技术, 这都不利于典型楔形石核的预制,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最早的楔形石核——下川类型楔形石核缺乏预制过程, 形态不规整的原因之一。另外, 石叶技法也不发达, 目前公布的材料仅宁夏临武水洞沟一处<sup>[19]</sup>, 且其石核以近棱柱形石核为主, 没有楔形石核。若宽型楔形石核是由两面加工的舌形器物改制而成, 这种技法则似乎更接近石核的预制,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宽型楔形石核的预制和楔状缘两面加工去薄的特点在中国北方缺乏技术传统。相反, 在西伯利亚地区, 两面加工的手斧在该地区早中期流行甚至到晚期; 勒瓦娄哇技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中石器时

代,为以后石叶技法和细石叶技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利于各种形态石核的修理;而且,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石叶技法和细石叶技法经常在一个遗址同时出现。目前,关于石叶技法和细石叶技法两者的关系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一种认为细石叶是石叶的细化,张森水先生认为细石器传统的起源与水洞沟文化有关;<sup>[20]</sup>而且认为无论从石器类型上或加工技术上看,细石器传统与长石片传统关系密切,可能存在渊源关系,而与小石器传统关系相当疏远,在技术上和类型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石叶工业是细石器工业的祖型<sup>[21]</sup>。而盖培先生认为石叶和细石叶的剥片技术明显不同,石叶和细石叶在石核修理技术上也很不同,石叶和细石叶间不存在传承关系,而认为细石器传统的代表的楔形石核已出现于晚更新世早期的一些工业中<sup>[22]</sup>。侯亚梅先生则认为东谷坨石制品已有楔形石核的雏形<sup>[23]</sup>。李炎贤先生认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两种工业是并行的<sup>[24]</sup>。但不管这三者的关系如何,在研究中均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林圣龙先生在《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一文中引用 G.Clark 的五种技术模式认为,模式四的主要特征是石叶技术和石叶工业,也是直根于模式二和模式三技术的母体的,因为在勒瓦娄哇技术中就包含了生产石叶的技术<sup>[25]</sup>。另一个问题是前面已经谈到的多数学者认为楔形石核是在两面加工的舌形器等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但在中国东北和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均缺乏或极少两面加工的传统,这也可以从下川的石制品中看出来。基于这两点(石核预制和石器的两面加去薄传统),我们认为从石器技术传承来看,宽型楔形石核的首次出现不应该在中国东北和华北,更可能在西伯利亚地区。

从年代学方面的证据来看,北美洲的细石器遗址明显晚于中国华北和西伯利亚地区,日本群岛的遗址也相对较晚,这两个地区都不会是细石器的起源地,应均为末次冰期海平面下降出现了大陆桥而传播进去的。大致在距今 10000 年前这个传统的细石器已度过白令海峡陆桥到达阿拉斯加的西北部;至少说占据亚北极美洲的西北部的费尔班克斯——海栗湖(Fairbanks—Healy Lake)地区大致是距今 11000 年,并且随着威斯康星冰川的退缩到达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约是在距今 9000 年<sup>[26]</sup>。而日本的细石器文化无疑是从亚洲大陆传播过去的,传播的途径可能主要有两条主要通路,一条是通过鞑靼海峡到达库页岛,然后向南分布;一条是从堪察加半岛经千岛群岛向南分布<sup>[27]</sup>;特别是日本与渤海湾周围地区细石叶文化的关系密切<sup>[28]</sup>。近年,在朝鲜半岛的两个

遗址发现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播路线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公州石壮里遗址(C14 20830 年)、垂杨介遗址(C14 18630—16400 年)。前面我们看到下川文化的年代达到距今 21700-16400 年,虎头梁的年代更只有距今 1 万余年,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更甚至 25000-24000 年甚至更早。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北地区虽然发现了很多细石器材料,但多为采集地点,没有可以直接测年的碳标本材料等,现有的年代学研究结果主要是依据石器本身的特点和地质埋藏学分析所得。虎头梁遗址的测年仅 1 万多年,明显晚于西伯利亚各地区,从年代学证据来看,典型楔形石核的起源也更支持西伯利亚地区,特别是外贝加尔湖地区和远东南部地区值得关注。

另外,从 25000-11000 a.B.P.,在北、中、东亚气候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反映在这些地区广泛使用石叶和细石叶加工的复合工具,虽然目前对这些复合工具的安装和功能不完全清楚。从细石器的空间分布来看,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除了北美西北部、日本群岛外,细石器由东西伯利亚延伸及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华北。另外,在新石器时代,由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延伸到西南的“半月形传播地带”,童恩正先生认为这一从东北绵延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的自然景观十分相近,它是一种基本上由高原灌丛与草原组成的地带;而国内西藏等地细石器的变异(variety),主要应视为时代的差异,而非系统的不同<sup>[29]</sup>。而陈淳先生认为基于细石叶在我国分布于差异极大的生态环境中,看来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工艺技术和工具是对相同环境的适应。同时,又认识到在更新世晚期,除了很少例外,华北大部、蒙古、东西伯利亚、日本和北美西北部的气候都以干冷为特点,这些地区的古环境以针叶林、干燥草原、旷原、苔原以及泰加型植为特点,气候一直到全新世才有转暖的迹象。我们可以认为,当晚更新世细石叶技术在这些地区繁盛的时期中,很少植物资源适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细石叶很可能代表了一种人类开拓动物资源为主的工艺技术<sup>[30]</sup>。这些地区的石器工业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而形成各自的特色,细石器本身只是这些石器工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传播更可能是来自气候变冷、食物资源短缺的驱动。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宽型楔形石核可能起源于西伯利亚地区,华北地区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宽型楔形石核加工技术受到了来自前者的影响。至于整个细石器技法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单中心和“趋同”仍然在争论之

中,简单的拿各种剥取细石叶的细石核的年代做比较可能不能得到完满的答案。而且,不管从文化性质、石器技术和年代学等方面的证据要来比较柱状石核、锥状石核和楔形石核谁早晚都条件其实都不是很成熟。一是因为遗址数量相对较少,特别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多为采集地点,能提供准确C14年代的也少;二是在中国发现含有细石器的遗址地层堆积多缺乏连续性,不能直观的观察上下文化层石器工艺方面的继承和变化情况,从而使得细石器技法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共存的其他技法的关系问题尚不完全清楚;三是国内外学者间对石核形态和加工技术等描述的术语相差甚远,不利于研究的开展。

绘图:曹桂梅

注释:

[1]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2] 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燕京学报》第33卷,1948年。(《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3]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2期。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4期。

[4] 李永宪:《略论四川地区的细石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5] 杜水生:《楔型石核的类型划分与细石器起源》,《人类学学报》第23卷增刊,2004年10月。

[6] 高星:《评介“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时代:新的发现与阐释”》,《人类学学报》第19卷第2期。

[7] 陈淳:《中国细石核类型和工艺初探——兼谈与东北亚、西北美的文化联系》,《人类学学报》第2卷第4期。

[8] Smith, Jason W., 1974: The Northeast Asian—Northwest Microblade Tradition.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1, No.3/4. 转引至4。

[9]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2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中石器时代数据集成1965—1981》第18页,文物出版社出版1983年6月第一版。

[11] 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12]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4期。

[13] 李隆助著,李占扬、李勇军译,赵志文校《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文化——主要记述秃鲁峰和水杨介遗址》,《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

址》,《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

[14]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P142-146, Edited and Compiled by Anatoliy P. Derevanko, Dmitri B. Shimkin and W. Roger Powers, American Editors; Translated by Inna P. Larichev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1998.

[15]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P129-131, Edited and Compiled by Anatoliy P. Derevanko, Dmitri B. Shimkin and W. Roger Powers, American Editors; Translated by Inna P. Larichev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1998.

[16]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P131-132, Edited and Compiled by Anatoliy P. Derevanko, Dmitri B. Shimkin and W. Roger Powers, American Editors; Translated by Inna P. Larichev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1998.

[17]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P281-285, Edited and Compiled by Anatoliy P. Derevanko, Dmitri B. Shimkin and W. Roger Powers, American Editors; Translated by Inna P. Larichev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1998.

[18]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P285-286, Edited and Compiled by Anatoliy P. Derevanko, Dmitri B. Shimkin and W. Roger Powers, American Editors; Translated by Inna P. Larichev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1998.

[19] 汪宇平:《水洞沟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62年第11期。贾兰坡、盖培、李炎贤:《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8卷第1期。

[20]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1期。

[21]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第9卷第4期。

[22]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4期。

[23] 侯亚梅等:《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的发掘》,《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2期。

[24] 李炎贤:《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划分》,《人类学学报》第12卷第3期。

[25] 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比较》,《人类学学报》第15卷第1期。

[26] Smith, Jason W., 1974: The Northeast Asian—Northwest Microblade Tradition,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1, No.3-4.

[27]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2期。

[28] 加藤真二,袁靖译:《对日本、渤海湾周围地区细石叶文化的几点认识》,《考古学文化论集(4)》,文物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29]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30] 陈淳:《东亚与北美细石叶遗存的古环境》,《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